

“生活与制度：中国社会史新探索” 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2018年9月10—12日，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生活与制度：中国社会史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海内外32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3位专家学者围绕“礼法、士人与生活”“医疗卫生与生活”“性别与生活”“移民与地方社会生活”“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水的生活与制度”“制度与生活的多样性”等多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常建华指出，“生活与制度”的概念，旨在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提出新的挑战，开启创新性探索，以期对未来的社会史研究产生影响。李志生对虢国夫人的衣食住行展开综合讨论，具体呈现其日常生活的面貌及违礼僭制的情形。铁爱花聚焦女性闺阁之外的移动空间，从制度与实践层面对宋代女性随亲宦游的行旅活动进行了考察。常建华将对东北奉天地区的移民生活观察，置于清廷对于汉族人进入东北地区的相关制度及制度调整的大背景下，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呈现了流寓民在规避、利用乃至违反相关制度的情形下顽强生活的具体情形。王振忠利用《开检可观》稿本较为细致地揭示了祁门云村的日常生活，考察了晚清民国时期徽州的乡村治理，进一步揭示出这些与徽州日常生活中历时已久的民事惯例之间的渊源关系。董乾坤利用徽州账簿对乡村塾师在晚清科举制变革背景下的生活实态进行探讨，展示了教育改革背景下，作为乡村塾师的胡廷卿如何变通以应对变革，其间，制度变迁与其家庭生活之间关联甚密。徐斌及陈瑶深入探讨了王朝国家的制度与水域社会及水上活动人群的互动关系。周尚兵利用敦煌文书P.3644中的“店铺徠客叫卖词”，结合S.6208“干味部”记载，分析得出中古敦煌地区日常饮食生活中的调料清单。会后，学者们就文书释读问题、中古敦煌地区饮食生活的时空特色解读、药食同源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作为一种研究取向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亦丰富了制度实践研究的面向。从生活史的角度反观制度史的研究，能够使传统的礼法制度、思想文化、宗族家庭、民间信仰等研究领域焕发新的生机，在问题意识、研究理路与写作方式上有所创新和发明。山本英史透过历代王朝的溺女法制禁令，观察生活层面的溺女“陋习”，进而探

讨国家权力能否渗透至基层社会的问题。陈宝良将礼制放诸生活的场域，探讨了有明一代作为一种“生活法则”的礼制与作为“生活艺术”的礼如何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如何与明代文人的生活观念、行为方式深入互动的过程。张艺曦将族谱资料创造性地应用于思想文化史领域，重构、复原金溪读书人的言行事为。卞利利用徽州文书资料，对明中叶以来徽州清明会创立缘起、功能、特点、资金筹措以及运行机制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强调了王朝礼制变革、徽商崛起对徽州宗族墓祭活动产生的影响。郭锦洲通过“庙户”制度在篁墩忠壮庙的变化中所起的作用，来探讨明朝的祭祀政令带来的民众生活层面的变化。罗艳春将清代的旌表制度与江西万载黄茅周继德六世同居之家的形成关联起来思考，强调对朝廷旌表的累世同居之家进行“在地化”的分析，以期在空间视角下对族群关系进行重新解读。张传勇从宏观层面对明清村镇城隍信仰进行研究，挑战了传统的以滨岛敦俊为代表的村镇城隍信仰是城隍信仰“淫祀化”的解释模式，认为以“非官方化”取代“淫祀化”更符合明清村镇城隍信仰的实际情况。

此外，本次会议还汇聚了社会学、艺术史、医疗史、考古学等众多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紧扣“生活与制度”的主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会上，张佩国强调了“制度生成”理论对于推进生活史研究与制度勾连议题的指导性意义；艺术史出身的陈芳与吴若明的研究则提醒我们将图像与物品作为重要史料在日常生活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余新忠、张嘉凤、王文基等医疗史领域的学者指出作为习惯与规约的制度在日常性的医疗卫生世界同样“在场”；耿超与闫爱民的对话则展现出考古学与日常生活史相互碰撞产生新的问题意识的可能性。这些学术讨论与争鸣充分体现出跨学科交流、借鉴多学科研究方法对于丰富和创新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助益。

自2008年以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将“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作为一段时期内着力发展的重要课题，已成功举办七次研讨会，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并走进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领域，“日常生活”的研究理路正日渐成熟。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王嘉乐）

（责任编辑：张欣）